



潘大明

著

長河可歌

七君子

1936年七君子事件与他们的命运



中西書局

潘大明

著

長河秋歌

七君子

1936年七君子事件与他们的命运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河秋歌七君子/潘大明著. —上海:中西书局,
2016. 8

ISBN 978 - 7 - 5475 - 1118 - 3

I. ①长… II. ①潘… III. ①七君子事件(1936)—
史料 IV. ①K264.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4900 号

长河秋歌七君子

潘大明 著

责任编辑 张安庆

助理编辑 裴杰

装帧设计 梁业礼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昌鑫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50×960 毫米 1/16

印张 21

版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475 - 1118 - 3 / K. 211

定价 58.00 元

—

这是沪上远郊一处充满人文气息的公墓，那座神采飞扬的群雕默默地矗立在深秋的晚霞中，显得格外地苍劲和奔放。栩栩如生的七个塑像，如音符组成的气势磅礴的乐章，回荡在空中，久久不愿散去；七双铜铸的眼睛透射出执著、坚毅、慈祥、期望，渴求中隐约飘动着丝丝焦虑。

群雕前的草坪，依然很绿，绿得深沉且顽强，偶然绽出铁锈色的草叶，预报着冬天的信息。我漫步在草地上，贪婪地吮吸着深秋特有的清新，感受到这清新正孕育着冬天过后、春天到来的崭新的景象。

人生赋予秋天的意义大相径庭：伤感者称它为悲秋，仿佛一切笼罩在凄凉之中，似乎不再迎来春天；垂暮者把秋天与死亡相连，落叶中觉得死神的催促，一片枯叶也令他胆寒。

多少首秋歌，引来悲凉；多少个秋天，激起诗人的忧伤。他们没有感知秋天独特的旋律，和那如金属般撞击的铿锵，在铿锵的旋律中，仿佛巨人走来，踩过金色的落叶，碾碎片片悲凉，召唤人们迎接挑战，战胜严寒的无情。秋，强者的诗，巨人的旋律，宛如一双青筋隆起的大手在黑白相间的琴键上敲击出撼人心肺的音符。

突然，一个身穿红色上衣的女孩闯入草坪，打断了我的遐思。女孩正在追逐一只火红色的气球。于是，一片深沉的绿色中涌动着一簇火焰。她执著地追逐自己的一份心爱，没去斜视咫尺间的群雕，径直绕过塑像，消失了踪影。我想续上自己的思路，可惜有点难为了自己。

不一会，女孩回到草坪，手中攥着气球，一脸胜利。我问：“你为什

么不看一眼雕塑？”女孩大约觉得我的提问十分古怪，反问道：“我为什么一定去看它呢？我在追气球。”女孩洒脱地远去，带着她的气球消失在草坪上。

我凝望着女孩渐去的身影，不禁想起群雕中的那位美髯飘拂的长者——沈钧儒，在年富力强的中年时，对儿童说过这样一段话：他们是祖国未来建立民主社会强有力的童子军。儿童不是家庭的私有产财，而是属于社会，他们只是家庭的一个过客，肩负着铲除旧制度、一切恶习的重任，无异是国内唯一的希望……

相去近百年的声音，始终在我耳畔回荡，袅袅荡荡，寄托着对后来者的厚望。

也许有的人会说记忆在时间磨损下，将变得依稀朦胧，甚至忘却也属于正常范围。何况，一个距今遥远而陌生的声音，即使它记录在史册上，没有人翻动似乎也无可责怪。

然而，人们不应该忘却他们那一代的奋斗和业绩，记住他们的苦难和殷切期望，为的是铸就明天的辉煌。

二

金叶飘坠的秋季，一缕阳光透过窗棂，折射在《辞海》第13页上，密密麻麻印着一段文字，记载了1936年发生的一桩著名的事件，如蝉翼般透薄的纸页闪烁出一束神圣的光泽。

【七君子事件】1936年5月，沈钧儒、邹韬奋等响应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在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并与红军议和，建立统一的抗日政权。国民党政府坚持卖国内战政策，于11月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七人，时称“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引起全国人民反对，各地展开了

营救活动，到 1937 年七七事变后，沈钧儒等被释放。

条目扼要、简单。历史的全貌与条目之间，前者丰富且完整，远远超过后来者对它的注脚。浩荡历史大潮送走无数的细节，留下只字片语的梗概，提示人们不该忘记过去。回眸寻找他们在历史过程中留下的足迹，人们会由衷地感慨；细嚼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人们会懂得过去，认识真实的他们和事件……

仔细揣摩这一条目，我陷入沉思：七君子事件出现在 1936 年绝非历史的偶然，本质上无法摆脱历史发展过程中内在规律的支配，所谓偶然恰表现出不易一目了然的必然。七人走过各自漫长的人生路，于同时同地同案被逮捕，凛然登上囚车，反映了他们思想实质的一致和实践目的的统一性。1936 年 11 月—1937 年 7 月，七人短暂的相聚，呈现在史册上无疑是一种显性的集合，体现出他们共同的精神和追求。然而，在这一时期之前，七人长期处在一种隐性的集合状态中。同样，显性集合状态过后，他们又回到了隐性的集合状态中。无法否认的是，处于隐性状态七人的精神实质、行为所需达到的目的依然具有同一性，纷繁的现象掩遮不住内在的联系。

理性的思考，不免过于抽象，似乎不好理解。我脑海里屡次闪现着 1936 年 11 月 23 日凌晨，一个十分具体的时间，仿佛听到黑暗中凄厉的警笛，看到七人从容登上囚车的背影。

目 录

引 言 / 1

硝烟·议和·抗争

——1936年以及那个深夜……

1936年的中日两国 / 6

七人与救国会的成立 / 11

来自南京的压制 / 15

瓦窑堡的特使 / 20

到南京去请愿 / 24

国人难忘九一八 / 26

救国会与鲁迅葬礼 / 28

七人被捕的导火线 / 39

那个冬夜的故事 / 43

第二次被捕 / 51

不是凯歌却依然要高唱 / 60

七君子事件与1936年中国社会 / 66

发端·自强·健儿

——寻找他们的人生轨迹

爱国主义的萌生 / 73

爱国者的人格 / 77

外来文化和新爱国主义 / 81

求实精神与七人爱国特征 / 86

五四大潮中的健儿 / 88

五四运动对于七人的意义 / 92

警钟·国难·抗战

——从济南惨案到七七事变

警钟再次敲响 / 123

九一八·九一八…… / 129

囚禁看守所 / 143

禁止探视 / 147

女牢中的史良大律师 / 148

拒绝反省 / 149

开庭审判 / 151

爱国入狱运动 / 159

在七七事变炮声中迈出牢房 / 164

相聚·离别·远行

——期待一个崭新的中国

从武汉到重庆 / 171

孤身在皖北 / 176

在陪都重庆 / 179

转辗在红色根据地 / 183

威逼·利诱·出走 / 186

聚散的君子们 / 193

建立在苏北的丰碑 / 196

邹韬奋之死 / 206

为民主而战 / 217

李公朴最后的时刻 / 222

从上海到香港 / 232

相聚在五星红旗下 / 237

倾情·求实·诤言

——生命的白帆消逝

倾注在共和国事业中的热情 / 252

五人与民主党派 / 257

不灭的求实精神 / 262

教授的遭遇 / 265

一个部长的命运 / 270

对右派的回击 / 274

举杯声中与世长辞 / 278

乌云中流逝的生命 / 285

章乃器,大写的人生 / 290

“沙僧”之死 / 300

史良最后的历程 / 303

结 语 / 307

后 记 / 313

硝烟·议和·抗争

——1936年以及那个深夜……



1936年9月18日，沈钧儒(前左一)、史良(前左二)等率领群众进行纪念九一八游行。



1936年3月8日,上海妇女界救国会等组织各界妇女在南京路举行游行。

版一第 張一第 (三期星)

報 情 亡 救

日六月五年五十二國民華中

救亡言論

認敵人的目的 王雲時

在我國不在敵。...

發刊辭

救亡救亡，已為中國全體國民的呼聲。...

救亡情報

九室相伯

創刊號
 本報一週一版
 每份售錢一分
 編輯及發行
 上海上海路
 上海路上海路
 上海路上海路

最可紀念的一個月

五月廿五日，是中國婦女界救國會...

輿論

...

讀我們的報刊前進

...

...

1936年5月6日出版的《救亡情報》創刊號。



1936年6月21日,上海各界救国会发起上京请愿活动。
图为请愿活动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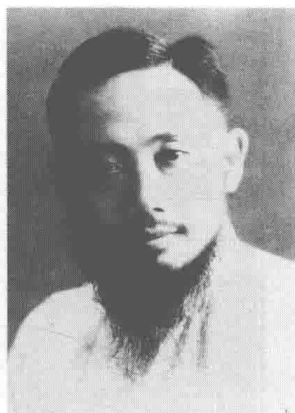
鲁迅葬礼现场章乃器在发表演讲。



沈钧儒像。



邹韬奋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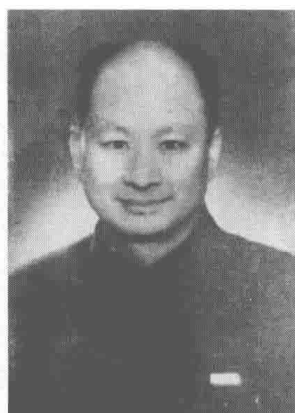
李公朴像。



沙千里像。



史良像。



章乃器像。



王造时像。

1936年对于国人来说,是一个怎样的年份呢?在上海现存最早的近代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里,那些尘封已久的书刊报纸,记录着当时的人们写下的一些文字,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人们的感知。

1933年12月12日,《北京晨报》教育版头条刊登了《北大1936年研究会大纲》,《大纲》表示:1936年的中国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决定着中国存亡。中国青年要及时做好知识和技术上的准备,迎接这一年的到来。草拟这份《大纲》的是北大的一名穷学生,他不能安心神游在柏拉图、苏格拉底古典哲学流派中,认为国难当头,读书、文化救国如同蓝天上的云彩,好看却过于缥缈,应该行动起来,共赴国难。后来这个学生成了现代著名的新闻记者,他的名字叫范长江。

一位未来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一九三六年》的后记中,忧心忡忡地写道:“现在是一九三四年的秋天;中国的江南还刚刚是桂子飘香的好时候,然而我们一想到将要来临的一九三五年、一九三六年,不禁栗栗危汗!我们相信这一次人类空前的巨劫,这一次人类的大残杀确乎是不可避免的了!”

人们在诚惶诚恐中迎来了1936年的元旦钟声,未来的三百六十五个日夜里,不知哪一天醒来自己或许就成了亡国奴。这一年11月,近代军事强人段祺瑞客死上海法租界,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曾把部分主权出卖给日本以巩固自己地位的段执政,临终的遗言是“国事如此,全国上下逐应一心一德,团结救亡御侮”。国家危在旦夕,稍有良知的中国人岂能置故土而不顾,无动于衷?

腥风血雨的1936年,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一年。一位深知内幕的亲历者写道:它是中国现代社会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同样,对彼岸的岛国——日本也是一个重要的年份。

1936年的中日两国

1935年7月25日,似乎不在1936年范围内,可是它决定了1936年的走向。在遥远的莫斯科,正在举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王明、康生、吴玉章、张浩(林育英)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国家的六十四个共产党组织派出的五百一十名代表出席。会上,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出生在奥斯曼帝国拉多米尔其的保加利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作了题为《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向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问题。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通常被称为的“八一宣言”),分别送交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经同意后,公开发表。但是,由于条件限制,共产国际无法向国内的中共中央传达,直到11月张浩回国后,中共才与共产国际联络上。

这时,衣衫褴褛、装备简陋、人员疲惫的中国工农红军,在来自韶山冲的毛泽东率领下,完成长征,进入仅存的苏维埃边区——陕北。1935年12月17—25日中共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中共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议形成《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指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会议结束后,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的名义,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同时,秘密派出使者与国民党进行高层谈判,试图叩开国共合作大门。毛泽东以他敏锐的洞察力认识到,国民党南京政府是民族运动中一支重要力量,中共的方针过去是愿意

谈判,现在仍继续这个方针。秘密特使重回上海,与陈立夫会谈。国共两党高层会谈在继续。与此同时,中共积极与国民党军事实力派接触,争取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刘湘、张学良、杨虎城等支持中共的抗日主张。经过努力终于实现了西北大联合。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和红军达成默契;西北由两军对峙,转为两军停止敌对状态,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

历史机遇与挑战同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了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国共两党重新合作有了基础,挽救民族危亡不再是一种虚幻。

蒋介石对于西安事变始料不及,他不会想到自己拜把子、换帖儿的小兄弟——少帅张学良,会使出兵谏一招,使他无可奈何地结束国内战争。

对于联合红军抗战,蒋介石不是没有想过。在中共瓦窑堡会议召开前的一个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根据蒋介石建议通过一个议案,表示:“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1935年底,蒋介石派出心腹陈立夫秘密赴苏联试探,要求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与中共的关系,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国与俄共三十年经历纪要》中写道:“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1936年1月22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向苏联驻华大使表示:“同共产党达成协议是可能的:红军承认中央政府及司令部的权威,同时保持自己目前的编制,参加抗日战争。”

蒋介石一面伸出触角进行政治试探,一面仍调集大军继续围剿红军。爱穿黑色大氅的国民党军事委员长从骨子里惧怕陕北的那群“赤匪”,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他试图一举消灭红军,以解决心腹大患。他下洛阳飞西安,亲临前线督战。西安兵谏,迫使他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担保内战不再发生,蒋委员长认为签字画押有损体面,发誓以人格担保。

1936年末的兵谏事件，不仅对1936年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使这一年变得重要起来，而且影响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

1936年对于当时中华民族的敌人，海波涌动中的岛国——日本，也同样重要。

昭和11年(1936年)2月26日，一群少壮派将校率领一千五百名官兵袭击了内阁，成功地杀死了内阁大臣、大藏大臣等人，瓦解了一个主张缓步吞食中国的温和政府，加速岛国的法西斯化进程。臭名昭著的国家主义者广田弘毅被召回国，组织内阁。内阁成员的人选需经军部画圈，军人出任军部大臣，强化军部对政治的支配，严格控制内阁。广田内阁的政策根据军部要求的所谓“庶政一新”、“广义国防”来制定，完成了军政合一体制的建立。8月，首、外、藏、陆、海五相会议，决定“国策大纲”，以“稳步地向海外扩张，谋皇道精神的实现”，“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为根本国策。11月日本与德国、德国与意大利结成联盟，分别展开对邻国的侵略。1936年的日本大体上已经完成了下一年对中国实行全面侵略的战略准备。

1936年中日关系到了剑拔弩张的紧张程度。华北出现了由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大小汉奸组成的“自治政府”、“政务委员会”，日本试图通过“自治”，变华北为满洲国之类的殖民地；内蒙一些王公在他们的指使下，点燃绥远战火，中华儿女为了保持祖国领土的完整，不惜血洒百灵庙。1936年中日冲突，是一场没有防线的战斗，日本散布在中国土地上的租界，成了弹药库，到处出现了日人挑起的事端。据史书记载，日本军警、侨民在北平、上海、天津、汉口、太原、汕头制造了十四起有影响的事件。

1936年九州大地上弥漫着火药味，南京政府一边备战，一边试图通过外交手段驱散呛人的味道，平息中日之间的争端，仍然在作“和平之最大努力”。对和平的追求，成了南京政府1936年对日的主要口径。

但是，军事上的准备正紧锣密鼓地开展。据张治中将军晚年回忆：“1936年2月，南京国民党政府为了准备对日作战，划全国为几个国防